

吳其昌劉節交遊考略

洪光華* 王江鵬**

摘要 吳其昌、劉節是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學生，又是同鄉。二人在學術研究，特別是古文字與先秦史領域內取得的成績深受王國維的影響，在學術道路上也受到梁啟超、陳寅恪的關心和提攜。本文以新見吳其昌贈劉節號季子白盤拓片為契機，結合劉節家屬所藏劉節致袁同禮、衛聚賢、侯堉等多封未刊信札，考論吳其昌和劉節從清華求學至任教於各個高校的數十年間，商榷學術、疑義相析的交往歷程。二人的學術交往可以折射出清華國學院學子間深厚的情誼，以及他們為推動學術發展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關鍵詞 清華國學院；吳其昌；劉節；學術交誼；號季子白盤

2021年11月10日，溫州衍園美術館舉辦之“甌越此門兩代賢——劉景晨誕辰一百四十周年、劉節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展”開幕。展覽中，一幅吳其昌題贈劉節之號季子白盤（以下簡稱“號盤”）拓本係首次得觀。號盤拓本由溫州楊瑞津先生借出展覽，楊氏是劉節三弟劉武之女劉鳳蓀夫婿，若干年前，劉節哲嗣劉顯曾、劉頌曾將此拓本及其他劉節先生遺物交其保管。

這幅拓片及題字，見證了吳其昌與劉節深厚的交誼。我們深感有必要撰文對吳其昌、劉節的交遊進行研究。

一、同學又同事

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號正厂，浙江海寧人。吳其昌於1925年考入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以下簡稱“清華國學院”）；1928年畢業後，任南開大學講師，後任清華大

學講師；1932年改任武漢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抗戰軍興，其隨校遷至四川樂山，兼任史學系主任；1944年，因肺結核病不治離世。

劉節（1901—1977）字子植，號青松，浙江永嘉（今溫州市鹿城區）人。劉節於1926年考入清華國學院；1928年畢業後，歷任南開大學、河南大學、燕京大學、大夏大學、浙江大學、金陵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等校教席；1931年夏至1935年秋，任國立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兼金石部代主任；1977年，因喉癌不治逝世於廣州。

1925年，清華國學院第一屆招生，吳其昌以第二名成績考入該院，第一名是河南劉盼遂（1896—1966，名銘志，以字行，河南信陽人）；1926年第二屆招生，第二名劉節，第一名是河南謝國楨（1901—1982，字剛主，河南安陽人），故有“河南出狀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話流傳。¹研究院修業期為一年，成績優異者可以申請再讀。吳其昌連讀三屆，劉節讀了兩屆，故二人同於1928年離校。

清華時期，吳其昌、劉節二人之導師皆為梁啟超，且他們又為浙江同鄉，因此關係密切，形影不離。這方面從1927年王國維蹈昆明湖

* 洪光華，博士，任職於澳門城市大學，曾在《澳門理工學報》《南方都市報》等刊物發表論作多篇；輯註之劉節《金石書錄解題》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 王江鵬，南京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曾在《中國史研究》《讀書》等刊物發表論作多篇。

自盡噩耗傳來時，二人相攙痛哭的情景，亦可見一斑。

劉節〈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載：

迨席將散，一人約曹校長出座私語。有間，校長返入語人曰：“傾聞同鄉王靜安先生自沉頤和園昆明湖，蓋先生與清室關係深也。”云云。闔座聞之，大驚，莫知所措。某猶不之信，即與同學吳其昌馳往各處探問。途遇趙助教萬里，得先生死耗屬實。其昌不禁大慟，某亦相對歔歔不置。時校中人已周悉其事。²

同學戴家祥（1906—1998，字幼和，浙江瑞安人）回憶：

在黃昏的的燈光下，看見迎面而來兩個人，是吳其昌和劉節。吳其昌聽到我的哭聲，也停着腳步，放聲大哭。劉節也啜變泣矣。劉節攙着吳其昌哭，趙萬里攙着我，找到校門口，幾十個師生擠上校車，直奔頤和園。³

1928年，梁啟超居天津養病，他推薦了幾位弟子至天津南開大學任教，方便師生合作進行學術研究。除吳其昌、劉節外，梁啟超還推薦了謝國楨、楊鴻烈（1903—1977，字憲武，雲南晉寧人）、姚名達（1905—1942，字達人，江西興國人）等人。1929年2月編印的《天津南開大學一覽》的教員名單即有吳其昌與劉節：

吳其昌，字子馨；籍貫：浙江海寧；住址或通信處：今校教員住宅一號；履歷：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職務：國文教員。

劉節，字子植；籍貫：浙江永嘉；住址或通信處：溫州城內世美巷一號；履歷：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職務：國文教員。⁴

吳其昌在〈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中也曾追憶道：“先師養病津門……弟子侍者，其昌及興國姚顯微（名達）、永嘉劉子植（節）。”⁵吳、劉二人同窗再同事，一起侍奉老師，聆聽教誨，並為老師送終。

吳其昌在號盤拓本題款稱劉節為“子植二兄”，因為劉比吳長三歲。那麼，大兄是何人？暫不詳。楊瑞津認為是王力（1900—1986，字了一，廣西博白人）。⁶王力長劉節一歲，二人情同手足，乃一生好友，我們認為楊君推測或可成立。

在1928年由梁啟超題簽的《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中，王力為劉節作小傳，吳其昌跋尾，其他同學之傳皆無此例，也可見三人關係之密切。吳其昌為劉節小傳題跋曰：

君名節，字子植，我浙之永嘉人。永嘉自北宋周、許、劉、鮑九賢傳河南程氏之學，餘一千載至於孫仲容先生，學問彬彬稱盛，君為能傳之學者。⁷

二、學術上切磋砥礪

清華國學院的老師對學生關懷備至，師生關係融洽，宛如親人，同學間關係亦復如是。這種情誼至畢業後依舊如此：

[1930年]六月，[吳其昌]先生在〈殷周之際年曆推證〉手稿後記曰：“舉世以不攻劉歆為不入時，以不敬外儒為不科學，我此文成，惟陳寅恪師、劉子植兄二人為然耳。”時賃居北平西四受壁胡同九號。⁸

其中，西四受壁胡同九號是日後成為劉節岳父的錢稻孫（1887—1966，字介眉，浙江吳興人）之宅第。當年九月，吳其昌即任清華大學專任講師。以吳劉之交誼，劉節必然曾前往吳其昌寓所拜訪友人。其與錢稻孫之結識，或許就此時。

文史研究

1929年，梁啟超逝世，在南開大學任教的劉節、吳其昌及諸同學萬分痛心。老師陳寅恪或在此時向傅斯年推薦戴家祥、陳守寔（1893—1974，字漱石，江蘇武進人）、王庸（1900—1956，字以中，江蘇無錫人）、顏虛心（生卒年份不詳，廣東台山人）、劉節、吳其昌、謝國楨去廣州中山大學任職。陳寅恪在信中略為介紹了劉吳二人的專長及近況：

劉節 古代史、金石考證等（現在南開教書）。

吳其昌 史學（宋代學術、制度）、目錄學等。聞廣東已聘，就否未定。因渠現與何廉等得美國Stanford大學經濟史研究會之委託，搜羅中國材料。吳君認為“中國歷代度量衡之變遷問題”，惟月僅百三十元，故廣東之行仍未決也。⁹

國學院師生及同學間的親近不僅是感情上的，還有在學術研究上的切磋砥礪。1928年9月9日，劉節回清華園，攜吳其昌請其過目校正之稿，徵求國學院助教浦江清（1904—1957，江蘇松江人）的意見。浦江清當日日記：

晨起，劉節君來談，且以吳其昌君〈關於新城新藏《周初之年代》一文之商兌〉稿見示。¹⁰

吳其昌〈關於新城新藏《周初之年代》一文之商兌〉稿，即刊於次年《國學論叢》第2卷第1號的〈日本新城博士《周初之年代》商兌〉。

1931年，劉節作〈屬氏編鐘考〉¹¹，請吳其昌過目斧正。吳其昌直抒己見，提出不同的看法，並作〈屬羌鐘補考〉。兩篇論文同時刊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6號。劉節說：

余既為〈屬氏編鐘考〉，粗通其讀，

猶慮其義之未安，質之吾友海寧吳君子馨。子馨曾為〈補考〉一篇，所論余亦未敢苟同。¹²

次年初，劉節至交¹³唐蘭（1901—1979，號立厂，浙江嘉興人）的〈屬羌鐘考釋〉¹⁴、清華同學徐中舒（1898—1991，安徽懷寧人）的《屬氏編鐘圖釋》¹⁵相繼作成。劉節為《屬羌鐘考釋》題跋時直言不諱：

今年春，余友唐君立厂、徐君中舒之考釋相繼成，咸殫精研思，自立壁壘，余復何言？惟二君之文，於余抵牾最甚。尤以釋𠄎為再，釋𠄎為伐，釋𠄎為𠄎，釋𠄎為韓，皆與余說大相徑庭。¹⁶

在為徐中舒《屬氏編鐘圖釋》寫提要時，劉節又直言“其說之可商榷者有三事”：其一，“編鐘應律呂之說更無根據”；其二，“不知邾氏三鐘，惟𠄎鐘可信，其他二鐘，字體滅裂，盡失古意”；其三，以𠄎“為𠄎字，其去古意遠矣”。¹⁷

1935年初，劉節的《楚器圖釋》¹⁸出版，吳其昌為此書及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遼寧海城人）之《尚書新證》寫書評〈《楚器圖釋》及《尚書新證》評議〉。吳氏充分肯定了兩書，說：

近一年來，學者新著，在古史樊圍以內，雖然傑出，可以傳久而行遠者，鄙見所及，惟有二書：一、永嘉劉節著《楚器圖釋》，二、海城于省吾著《尚書新證》。今分別論其得失。¹⁹

同時，吳氏亦對劉書“未及校出者亦有二處”及“劉氏尚未深考”之個別姓氏之誤，“斷不能同意”，謂“凡此種種，皆詳其昌之《金文氏族疏證》一書。積稿盈尺，至今未刊，故劉氏所未見”。²⁰

彼時學界對學術切磋問難皆常態，無論親

疏，不以為忤，實為砥礪精進之正途也。正如吳其昌女公子吳令華所言：

父親也無私地將自己的研究新得告知朋友，互獻諍議。學人治學，觀點不必一律，甚至完全相左，可以爭得面紅耳赤，而無傷友誼。²¹

這一切，在在體現了老師陳寅恪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三、虢盤拓本吳其昌的題款

虢季子白盤在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寶雞，今藏中國國家博物館。虢盤與散氏盤、毛公鼎並稱西周三大青銅重器。盤內底部有銘文，直排八行一百一十一字，內容講述虢季子白奉命出戰，榮立戰功，周王為其設宴慶功，並賜弓馬之物，季子白因而作盤以為紀念。

吳其昌贈劉節之虢盤拓本，尺寸為53.5×30厘米，裝裱在82×40厘米的紙中，左下有“肖均審定”和“二百蘭亭齋鑒藏”兩方朱文印章。

“肖均審定”印為吳昌碩所刻。²²肖均即沈毓慶。沈毓慶（1868—1902）字肖均（韻），上海川沙（今浦東）人；父樹鏞，字均（韻）初，咸豐九年進士，官至內閣中書，著有《漢石經室金石書畫跋尾》。沈氏父子好蓄藏金石書畫，秦樹才有《沈樹鏞毓慶父子金石書畫年譜初稿》。沈毓慶與吳昌碩有通家之誼，吳昌碩為其先後刻有“肖均”“肖均審定”“肖均審定金石”等印。

吳雲（1811—1883）字少甫，號平齋，晚號退樓，別署兩疊軒、二百蘭亭齋，浙江歸安（吳興）人，好古精鑒賞，著作有《兩疊軒彝器圖釋》《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虢季子白盤銘考》等。《虢季子白盤銘考》云：

是盤道光年間常州徐傳兼宰鄆時所

得，後載歸其家……余於咸豐己未詣徐氏訪此盤，摩挲竟日。既手拓其銘文，復依器之形製，屬汪嵐坡泰基縮摹於冊，並錄陳壽卿介祺、呂堯仙侄孫、張石洲穆、翁叔均大年、瞿珍之樹寶五家考證，余又參以管見為之逐句詮釋付梓行世……同治乙丑冬日歸安吳雲記。²³

由是可知，吳其昌贈劉節的這一拓片為吳雲於咸豐己未（1859年）手拓，並鈐“二百蘭亭齋鑒藏”印為記。拓本後歸沈毓慶，沈氏復鈐“肖均審定”印。

劉節為吳雲《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作提要時寫道：

歸安吳雲字平齋，有《兩疊軒彝器圖釋》十二卷已著錄……二百蘭亭齋者，雲家所藏楔帖有二百餘本，故以為名也。²⁴

流傳後世之虢季子白盤清季拓片有多本，但此拓片是在虢季子白盤出土不久之時，由鑒藏家吳雲手拓，可謂希矣。加之此本流傳有序，不僅有名家鑒藏印，而且還有近代名家吳其昌題款，實屬難得。

拓片右裱邊有吳其昌以金文題〈虢季子白盤〉詩一首，其云：

玄鉞彤弓錫征蠻，高陵洛水戰雲寒。
獵狁未滅尹甫死，故國斷腸寄虢盤。

下鈐“延陵之孫”白文小印一方，為吳其昌自用印。

“延陵”，即春秋吳邑。《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吳其昌出自延陵季子之後，故刻“延陵之孫”印以自用。同時代的史家顧頡剛（1893—1980，原名誦坤，字銘堅，以號行）少時亦曾向同學誇口道：“我要刻三方圖章：

文史研究



圖 1. 吳其昌題贈劉節之號季子白盤拓本（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一是‘勾踐後人’，一是‘大禹子孫’，一是‘少典雲初’。”²⁵

〈號季子白盤〉詩即吳其昌 1928 年之〈題手寫號盤銘贈六弟（戊辰冬季）〉。²⁶“六弟”即著名紅學家吳世昌。吳令華〈海寧吳其昌教授年譜〉載：“一九〇八年戊申，先生四歲，十月五日，六弟世昌（字子臧，1908—1986）生。”²⁷

拓片左裱邊則是吳氏楷體跋文：

偶得吾家退樓翁兩欄軒舊藏號季子白盤墨本一通于江夏徐氏，郵寄北都，奉貽

子植二兄教授。漫繫小詩，傷時念亂，不覺其音之哀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初夏，同學弟海寧吳其昌，時客郢州珞珈山國覺。

下鈐“正厂金石文字”朱文印一方。

“吾家退樓翁”即前揭吳雲。江夏、郢州，均指武昌。吳其昌跋文中云“江夏徐氏”，為湖北近代大藏書家徐行可。徐氏名恕，武昌人，其藏書印有“江夏徐氏文房”“江夏徐氏藏本”“徐恕之印”等。徐氏藏書思想開明，時有學者借閱其藏書以為研究之資，如黃侃、余嘉錫等。吳其昌任教武大後，與徐氏同城而居，自是時有往來，得觀徐氏所藏善本圖書、金石碑帖等。此吳雲舊藏號季子白盤拓片，便是得自徐氏。“珞珈山國覺”指武漢大學，吳其昌於 1932 年秋轉任該校史學系教授，而當時劉節仍任職於北平圖書館。1936 年，吳其昌寄號盤拓本予劉節時，劉氏已轉任燕京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對比吳其昌〈題手寫號盤銘贈六弟〉詩與贈劉節的〈號季子白盤〉詩，全詩僅末句有異文：前詩為“故國斷腸寫號盤”，後詩為“故國斷腸寄號盤”。吳其昌將本家先輩珍貴舊藏慨然轉贈劉節，從寫贈六弟到寄贈二兄，充分體現了二人同窗情誼之厚。

1935 年 6 月，中國被迫與日本簽訂《何梅協定》，中央軍退出平津地區，由西北軍二十九軍填補空白，日本人操控成立了不受南京政府控制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全國局勢岌岌可危。吳其昌以號盤底銘文“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及“搏伐獫狁”之典入詩，表達其“故國斷腸”的憂思。“傷時念亂，不覺其音之哀也。”

吳其昌是堅定的愛國者，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率妻諸湘及弟吳世昌絕食請願。吳其昌在無錫國學專修館時的同學王

蘧常（1900—1989，字瑗仲，浙江嘉興人）曾有文章專門提及此事，謂吳其昌“論國事，未嘗不嗚咽流涕……及都授清華，憤國事，合門絕食，自此名傾天下”。²⁸ 清華同學方壯猷（1902—1970，字欣庵，湖南湘潭人）亦在撰寫吳氏傳記時，鄭重記載此事：

十九年庚午轉任清華大學史學講師，旋迎家屬至燕，並送其弟世昌君入燕京大學，妻諸湘女士入美術學校。明年九月，瀋陽事變暴發，東北數省相繼不守。君“苦懣煩悲，不可忍堪”（引《金文世族譜》自敘中語），乃率家屬絕食赴京謁當局，請求明令討伐。雖經當局多方安慰而後復食，然自是國勢日危，君之憂思亦日深。²⁹

劉節也是堅定的愛國者，其岳父錢稻孫在抗戰中依附日本人已得高職，劉節遂逃離上海，輾轉前往西南大後方，以明心志。

1939年1月5日，劉節在上海至香港的船上，為防暈船斷食一日，飢餓難受之時想起吳其昌絕食之事：

至下午四時左右，船過瓊州海峽，風浪大作，同船者十分之九嘔吐。余因不食，得免此痛苦，然飢餓之難受，至今始親領其味，不知絕食者之苦如何度過？回想吳其昌君之舊事，為之悵然！³⁰

了解這些背景，有助我們理解吳其昌在號盤拓本題款之深意。

四、子馨不祿，聞之慘然

1932年秋，吳其昌接受武漢大學之聘。當年8月27日，容庚（1894—1983，字希白，廣東東莞人）“約吳其昌、于思泊、唐立厂、劉節、趙萬里、商錫永、羅常培、顧頡剛等來吾家便飯，作竟夕之談”。³¹ 眾朋友同行通宵所談何事？大概與送別吳其昌有關。

8月30日晚，容氏記：“商錫永等晚七時在玉華台與吳其昌餞行。”³² 顧頡剛當日日記亦云：

今晚同席：吳子馨夫婦、子植、芸圻、剛主、希白（以上客），斐雲、錫永、賓四、以中、立厂、予、森玉（以上主）³³

可見吳氏赴任武大之前，友人依依惜別之意。

劉節在日記中也留下了二人交往的一些片段。如1930年8月25日，吳其昌介紹劉節拜識顧頡剛。當日，顧頡剛日記有“吳子馨與劉子植來”。³⁴ 劉節亦有文記及此事：

後來有一年暑假從天津回到北平，同吳子馨先生到燕京大學去訪顧頡剛先生。這是我第一次見顧先生，他一見便引為同道，把他所做的工作都拿來給我瞧。³⁵

1939年1月31日，劉節輾轉抵達陪都重慶，駐中央大學任中英庚款董事會協助研究員，其時武漢大學已西遷於四川樂山。劉節的任期至是年暑期結束，吳其昌邀請其來武漢大學共事。1939年7月9日，劉節在日記寫道：“下午接子馨信，囑余能早日赴嘉定，余尚遲疑未決，即覆一函，告以近來情狀。”³⁶ 當中的嘉定，即為樂山古稱。

7月19日，劉節應教育部之邀，抵成都為四川省教育廳暑期講習班授“史料目錄學”課。7月23、30日及8月8日，劉節致函吳其昌，並約見面。8月11日，久違的兩位好友終於在成都重逢，欣喜之情自不待言。³⁷

1940年7月30日，劉節修書一封致金陵大學文學院長劉國鈞（1899—1980，字衡如，江蘇南京人）、中國文化研究所主任李小緣（1898—1959，名國棟，以字行，江蘇南京人）及該所專任研究員商承祚（1902—1991，字錫永，廣東番禺人），辭職離開金陵大學。³⁸ 7月31日，吳其昌來成都送別劉節赴重慶，並同訪王獻唐（1896—1960，名瑄，

文史研究

以字行，山東日照人）。《王獻唐年譜長編》載：“吳其昌偕劉節等來，繼遊大佛寺各處。”³⁹

吳其昌身體不好，早有病痛。戴家祥曾回憶 1937 年與他見面時的場景：

假期道出武昌，特地到珞珈山訪問子馨，他正患肋膜炎臥床，聞訊，強病迎見……他這是病情雖然穩住，但瘦骨嶙峋，臉色灰白得有些驚人。⁴⁰

1939 年春，劉節知吳其昌又病，非常擔心，曾於 5 月 2 日作函問候：“早六時起床，膳畢，作函寄吳子馨。前日聞陶元珍言子馨臥病兩周，故作函候之。”⁴¹ 抗戰中，吳其昌更是加倍努力工作和參加愛國活動，勞累過度，加之營養不良，醫療水平所限，卒罹患肺結核病，英年早逝於抗戰勝利前夕。

留存於世的劉節信札未刊底稿，記錄了劉節知悉吳其昌噩耗的過程，以及與朋友商量發專刊紀念摯友的一些歷史片段。

1944 年 2 月 27 日，劉節讀《大公報》得知吳其昌於“重慶歌樂山口”病故，痛如錐心，急急寫信詢問於重慶國立編譯館任職的同學侯堦（1902—？，字芸圻，安徽無為人）。⁴²

芸圻吾兄惠鑒：

疊奉兩札，迄未得覆，殊念。閱報知子馨病逝歌樂山口，異哉！子馨何以在重慶？既到重慶何不通知弟？英年去世，良可深悼！弟與子馨交近二十年無違言，在此亂世中永訣，思之不覺慘然！弟無從打聽，兄有所知否？盼有以告也。

崑此，即頌
著祺。不一一。

弟劉節頓首
二月二十七日⁴³

信中提及“弟與子馨交近二十年無違言”，當劉節得知最要好的同學來到重慶（“歌樂山口”）卻沒有通知自己，且好友去世幾日後自己才閱報得知，更讓他傷心難受，因此希望侯堦快將詳情告知。

同日，劉節再給重慶另一位同學、時任說文社理事長兼《說文月刊》主編的衛聚賢（1889—1989，字懷彬，山西運城人）寫信，核實吳其昌病逝之事：“閱報知吳子馨病逝歌樂山，至為駭異。兄能知其詳否？乞即告弟為要。”⁴⁴

3 月 5 日，方壯猷在《大公報》發表〈吳其昌教授事略〉：

……二十六年丁丑，肋膜炎發，雖經武昌同仁醫院治愈，而醫囑必須長期休養。旋國戰驟起，君則興奮異常，講演撰文，口誅筆伐，不遺餘力。次年武漢大學西遷，君隨校徙居蜀西之樂山，漸患嘔血之症。常於吐血之後，發炎之際，工作不輟，偶或暈倒，而稍息即強起工作如常。家屬友好有勸其節勞靜養者，輒以“國難嚴重，前方將士，效命疆場，後方教授，當盡瘁於講壇”為辭。蓋君實一熱血沸騰，而不及自計之愛國志士也。三十二年癸未春，猶力疾赴陪都出席史學會成立大會，並參加青年團代表大會，病由是日劇，因以不起。三十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樂山寓廬，年僅四十有一而。三月五日，暫厝於樂山德勝門外武漢大學公墓。⁴⁵

閱報後，劉節於 3 月 6 日即致函衛聚賢，云：“子馨確在樂山逝世，讀欣庵文知之，《大公報》錯成歌樂山，令人為之謎惘。”⁴⁶

3 月 26 日，劉節再致函衛聚賢，贊同《說文月刊》出版紀念吳其昌特刊，並允撰文：“兄為吳子馨出紀念刊甚好，弟當然有長文章。”⁴⁷ 5 月 26 日，劉節覆函衛聚賢，告知吳其昌紀念文正在撰寫中：“承囑為子馨紀念刊作稿，正在預備中，大約八月底左右可交。”⁴⁸ 今查文

文史研究

吳其昌說：

我以為“誠懇”，是一切一切學問的根本態度，無論哪一種學問，我都情願用我的生命去換這種學問，我就把我整個“身”和“心”，貢獻給這一種學問，我就拼命去做這一種學問，我就真用我的生命去換這一種學問。立了這樣一個誠懇、真摯、忠實的弘願，學問決計不會不造到最高一層。⁶⁰

劉節說：

身死同心死必定要同時，這可以證明此人心身力量的均衡。有了這種體質上的不矛盾，然後才可以產生學問上和做人上的不矛盾。

有志之士寧死不能上當。我覺得孔子有一句話說得最好，他說：“知之及之仁能守之。”真是立身的格言。仁的方面是很廣的，而孔子又說：“剛毅、木訥近仁。”《莊子》上說：“仁者與物為春。”我以為剛毅同和平，是仁能守之的最好註腳，因為和平才有辦法，剛毅可以永久。凡是惡勢力，其破壞人無所不用其極，威逼利誘還不算厲害，最厲害的莫過於製造空氣來動搖你的心理上的常態，使你逐漸失掉自信心，覺得害怕、覺得前途無望而自己投降。所以我須預備下滿腔能死的精神，才能有長生的出路。⁶¹

吳其昌和劉節兩位同窗好友所言雖有不同，其精神卻高度一致：其一，做人與為學必須相一致，才可能做好學問，做真學問；其二，學者要用生命做學問，絕不曲學阿世。

吳其昌求仁得仁，在其學術生命的高峰時溘然離世；劉節矢志不渝，一生用生命捍衛學術的尊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紀念這兩位傑出的學人，不只是因為其學術文章，更因為其道德風骨。

如今，當年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助教、同學們，全部都去了另一個世界相聚，懷念他們！

註釋：

1. 參見戴家祥〈懷念英華早謝的吳其昌同學〉：“（吳其昌）一九二五年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第二名，息縣劉盼遂名列第一。一九二六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招收第二屆研究生二十名，安陽謝國楨（剛主）名列第一，溫州劉節（子植）第二。清華園裡的北方員工誇耀狀元都出在河南省，南方員工則說榜眼都出在浙江省。雖說事出偶然，卻一時傳為佳話。”（載《戴家祥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38。）又，吳令華〈沸血胸中自往來——追憶父親吳其昌教授〉：“一九二五年，清華國學研究院開辦，被錄取者皆一時國學俊彥。父親以第二名之學力考入為第一屆研究生。第一名是河南劉盼遂，第二屆第一名河南謝國楨，第二名浙江劉節，於是研究院流傳‘河南出狀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話。”（載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傳薪》，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36。）
2. 柏生：〈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原載《國學月報》1927年第2卷8、9、10號合刊），收入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173-176。關於此文作者“柏生”即劉節，可參考《追憶王國維》的編者陳平原、王風在〈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題下註：“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認為柏生乃‘王國維門生戴家祥’，但陳鴻詳《“哀死學生”話自沉》引戴家祥言稱：‘柏生即戴家祥’，出於誤會。王老師逝世之後，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陸懋德在北京《晨報》發表一篇文章，語句不遜，我當晚寫了一篇文章進行反擊，仍在《晨報》刊佈，後來日本人橋川時雄把陸文和我的文章統統收在《文字同盟》的追悼專號，此外並未發表其他悼念文章。”（中華書局《學林漫錄》九集）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補跋》引戴家祥函稱，此文非其所撰，乃出自其同門劉節之手筆。（《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三輯）另陳鴻祥文註⑩提及‘兩種可能：一是《晨報》社長林柏生……二是衛聚賢……’按：此二說並誤，考諸本文，作者當係其時在院的浙江籍學生，則不外吳其昌、趙邦彥、何士驥、劉節、王沅莊、戴家祥數人。文中提及吳、何二人，自可排除。故戴言係劉節所作應可信。”
3. 〈王國維先生〉為戴家祥於1982年5月25日下午在上海華

- 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所作報告，後收入李新城、陳婷珠、沃興華選編：《戴家祥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634。
- 南開大學編印：《天津南開大學一覽》，民國十八年（1929年），頁10、12。
 - 吳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339。
 - 楊瑞津：〈吳其昌題贈劉節之號季子白盤拓本〉，“溫州衍園美術館”公眾號，2021年11月18日，mp.weixin.qq.com/s/2ai5PAnX94RGPzSrLtO_3Q，2023年9月29日讀取。
 - 參見《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小冊，收入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輯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無頁碼。
 - 吳令華：〈海寧吳其昌教授年譜〉，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325。按：北平西四受壁胡同九號為清末外交官、錢稻孫的父親錢恂（1854—1927，字念劬）、母親錢單士厘（1858—1945）的宅第。1935年，劉節與錢稻孫三女錢澄（1912—1996，字清之）結婚，錢澄檔案記載：“1920—1925年，住北京西四北受壁胡同九號，現改為西四北四條廿三號……1928—1932年，住北京西四北受壁胡同九號。”（1970年錢澄手書，現存劉氏後人處。）
 - 陳美延編：《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18—19。陳美延註：“此紙片王汎森排在一九二九年四五月至七月間，參考傅斯年在廣東任職時期及陳致容庚函三、四（一九二八年五月、八月）推薦戴、顏二君往廣州中山大學，且陳致函七謝國楨一九二九年二月已任教南開，似不至於四至七月間赴平工作等情況，估計此紙片可能寫於一九二八年。現姑且至於推薦戴家祥函之後。”參見陳美延編：《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15—18。按：陳美延將陳寅恪向傅推薦戴家祥之函繫於1928年而非1929年，然也。惟附後之推薦戴家祥、陳守寔、王庸、顏虛心、劉節、吳其昌、謝國楨名單，似與推薦戴家祥函並非同一時期，可能不在1928年，而在1929年。1928年秋，吳其昌、劉節、謝國楨等學生已至南開大學任教，故“吳其昌……現與何廉等得美國Standford大學經濟史研究會之委託，搜羅中國材料”不應在本年，與“陳致函七謝國楨一九二九年二月已任教南開”亦相合。參見陳美延編：《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25。
 -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頁16。
 - 劉節：〈鳳氏編鐘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6號（1931），頁35—42。
 - 劉節：〈跋《鳳氏編鐘考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6卷第1號（1932），頁89—92。吳令華〈海寧吳其昌教授年譜〉：1931年“十二月，《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發表先生之〈鳳氏編鐘考〉，六千字。先是‘九·一八’前夕，先生與唐蘭、劉節同詣商承祚飲。商出示新得盧江劉氏藏鳳氏十二編鐘墨本，共同研習討論，相約各為考釋一篇。無何，東三省淪陷，先生悲憤欲絕，文遂擱置。越三月，劉、唐、商三先生之文已完成，而徐中舒先生之考釋亦已殺青，先生因作‘補考’一篇，‘以為四君子拾遺補闕’。”參見吳令華：〈海寧吳其昌教授年譜〉，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329。
 - 夏承燾通過劉節認識唐蘭，謂二人為“至交”。夏氏1931年12月9日日記：“接唐立厂（蘭）函。浙江人，東北大教授。與劉子植至交。”參見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253。
 - 唐蘭：〈鳳氏編鐘考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6卷第1號（1932），頁83—88。
 - 徐中舒的《鳳氏編鐘圖釋》，原名《鳳氏編鐘圖錄附考釋》，南京大學圖書館現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1932年）。
 - 劉節：〈跋《鳳氏編鐘考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6卷第1號（1932），頁89。
 - 劉節：〈《鳳氏編鐘圖釋》提要〉，收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卷29，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頁174。
 - 《楚器圖釋》於1935年1月由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包括劉節著〈壽縣所出楚器考釋〉，並附唐蘭〈壽縣所出銅器考略〉（原載1934年《國學季刊》第4卷第1期）文一篇。
 - 吳其昌：〈《楚器圖釋》及《尚書新證》評議〉（原載1935年5月2日《大公報·圖書副刊》第77期），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史學論叢上》，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453。
 - 吳其昌：〈《楚器圖釋》及《尚書新證》評議〉（原載1935年5月2日之《大公報·圖書副刊》第77期），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史學論叢上》，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454。
 - 吳令華：〈沸血胸中自往來——追憶父親吳其昌教授短暫而閃亮的一生〉，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詩詞文在》，

文史研究

- 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381。
22. 戴山青編：《中國近代印壇三大大家·吳昌碩篆刻作品集》，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0年，頁152。
 23. [清]吳雲：《號季子白盤銘考》，同治五年（1866年）二百蘭亭齋刻本，頁4。
 24. 劉節：〈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四卷咸豐六年歸安吳氏刻本〉，收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卷29，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頁139。
 25. 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1冊，北京：樸社，1926年，頁10。
 26. 吳其昌：〈題手寫號盤銘贈六弟（戊辰冬季）〉，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5。
 27. 參見吳令華：〈海寧吳其昌教授年譜〉，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311。
 28. 王遽常：〈吳子馨教授傳〉，《國文月刊》，第45期（1946），頁30。
 29. 方壯猷：〈吳其昌教授事略〉（原載1944年3月5日之《大公報》），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349。
 30. 劉節：《劉節日記》上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7。
 31. 容庚：《容庚北平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277。按：趙萬里字斐雲，羅常培字莘田。
 32. 容庚：《容庚北平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277。
 33.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2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681。按：錢穆字賓四、徐森玉名鴻寶。又，戴家祥晚年記憶有誤，其〈懷念英華早謝的吳其昌同學〉稱：“一九三四年八月，我受聘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子馨卻被清華大學文學院長蔣廷黻傾軋解聘，而被武漢大學聘為教授……”參見戴家祥：〈懷念英華早謝的吳其昌同學〉（原載《武漢大學校友通訊》1995年第2輯、1996年第1輯），《戴家祥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38。
 34.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2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432。
 35. 劉節：〈古史辨第五冊序〉，顧頡剛：《古史辨》第5冊，北京：樸社，1935年，頁7。
 36. 劉節：《劉節日記》上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111。
 37. 參見劉節：《劉節日記》上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115、117、120、125、126。
 38. 參見張求會、洪光華：〈劉節與李小緣等往來信函釋讀〉，《古今論衡》，第35期（2020），頁134。
 39. 張書學、李勇慧：《王獻唐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806。
 40. 戴家祥：〈懷念英華早謝的吳其昌同學〉（原載《武漢大學校友通訊》1995年第2輯、1996年第1輯），《戴家祥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38。
 41. 劉節：《劉節日記》上冊，1939年5月2日條，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76-77。
 42. 198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歷史考古叢書編輯組編《北京文物與考古（第二輯）》收有侯堯遺作《元〈鐵可墓誌〉考釋》。“鐵可墓誌”乃1962年出土於北京崇文區法塔寺，故筆者推測，侯堯應去世於1962至1986年間。
 43. 劉節致侯堯函稿一（1944年2月27日），未發表，現存劉氏後人處。
 44. 劉節致衛聚賢信稿一（1944年2月27日），未發表，現存劉氏後人處。
 45. 方壯猷：〈吳其昌教授事略〉（原載1944年3月5日之《大公報》），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349-350。
 46. 劉節致衛聚賢信稿二（1944年3月6日），未發表，現存劉氏後人處。
 47. 劉節致衛聚賢信稿三（1944年3月26日），未發表，現存劉氏後人處。
 48. 劉節致衛聚賢信稿四（1944年5月26日），未發表，現存劉氏後人處。
 49. 劉節致袁同禮信稿一（1944年5月8日），未發表，現存劉氏後人處。
 50. 吳令華：〈海寧吳其昌教授年譜〉，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334。
 51. 趙愛學：〈抗戰期間北平圖書館組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考古學叢刊》考〉，《文津學誌》，第2期（2020），頁193。
 52. 詳見趙愛學：〈抗戰期間北平圖書館組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考古學叢刊》考〉，《文津學誌》，第2期（2020），頁185-198。
 53. 吳其昌：〈《楚器圖釋》及《尚書新證》評議〉（原載1935年5月2日之《大公報·圖書副刊》第77期），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史學論叢上》，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454。
 54. 參見〈出版說明〉，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殷虛書契解詁》，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3。

55. 1940年，劉節相繼辭去浙江大學、金陵大學教職後，寓居重慶一小旅館專事研究、寫作，靠中英庚款會之協助款、教育部津貼及稿費為生。入不敷出，食不果腹，至1944年已被迫茹素兩年。戰時物價飛騰，稿費延宕，等於收入的減少，故在此函催促衛聚賢盡快清發稿費。同時期致中國史學會主席顧頡剛、致教育部次長顧毓琇、致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致中英庚款會協助科學工作人員委員會史學組主席委員傅斯年等人之未刊信稿，亦多有催促發放稿費、生活費、米貼的內容。參見劉節：《劉節日記》上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260。
56. 吳其昌：〈民族危機的認識和救國的治學的態度〉，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186。
57. 劉節的〈我之信條三則〉，原稿二頁，寫在中山大學講義稿紙上，原件曾於“甌越此門兩代賢——劉景晨誕辰一百四十周年、劉節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展”展出。此文最早收入楊瑞津編《劉景晨劉節紀念集》（香港：香港出版社，2009年，頁298-299）；後收入曾憲禮編《劉節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56-357），文後註“據劉節夫人手抄複印件”；亦收入《劉節日記》下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952-953）。劉節長子劉顯曾於《劉節日記》1966年9月26日條下註：“1999年檢拾遺物時發現兩頁手寫短文〈我之信條三則〉，估計就是這裡說的‘感想’……文章是作者夫人的字跡，且全文無標點。估計是為防止麻煩而採取的障眼法。”
58. 劉節：〈我之信條三則〉，《劉節日記》下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952。
59. 劉節：〈我之信條三則〉，《劉節日記》下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952-953。
60. 吳其昌：〈民族危機的認識和救國的治學的態度〉，吳令華主編：《吳其昌文集·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頁185。
61. 劉節：〈我之信條三則〉，《劉節日記》下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952-953。

